遭遇“双反”要抱团应诉更要谨慎反思

中国光伏企业抱团应诉，充分体现出中国光伏产品对美出口增长来源于市场竞争优势。此时正视中国光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中国光伏企业和市场正经历着无序竞争和产能扩容，出现了只盯数量、速度，不看质量、效益，盲目“大干快上”的现象。光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战略性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应着眼全局，拒绝功利化倾向，摒弃浮躁与浮夸。以科学发展的理念与创新机制为引导和保障，在应对国际光伏产业风起云涌时才能变得从容不迫，从而稳操胜券。

闻一言

11月29日下午，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牵头，英利、尚德、天合、阿特斯等14家应诉企业抱团，处于“双反”漩涡中的中国光伏产业终于集体发出了应对的声音。

抱团应诉 凸显中国光伏企业底气

如果说中国众多光伏企业以积极的姿态抱团应诉以表达自己对美国“双反”申诉声音的话，那么，这种应诉本身凸显了中国光伏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纠纷与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的当下的意义超出了应诉本身，充分体现出中国光伏产品对美出口增长来源于市场竞争优势，而非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这种来自本身实力的巨变决定了中国光伏企业敢于应对美国提起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申诉的底气。我们以积极和肯定的目光正视中国光伏企业抱团应诉的同时，也应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尤其对此次美国“双反”申诉有可能诱发欧洲市场效仿，造成整个行业可能有灭顶之灾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而正视中国光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

新兴战略性产业 必须摒弃浮躁

中国光伏企业和市场正经历着无序竞争和产能扩容，一些地方在谋划新一轮产业规划及“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把发展光伏产业当做重点。于是出现了只盯数量、速度，不看质量、效益，盲目“大干快上”的“割风”现象。光伏电池生产的下游加工制造环节过度投资，不断扩大产能，已呈现没有核心技术支撑的低水平扩张之势。

国内光伏产业收益近几个月直线下滑。在美国上市的天合光能、英利绿色能源、无锡尚德等中国光伏龙头企业，今年以来亏损严重，股价下挫70%以上，无锡尚德目前股价只有2美元左右，而它的股价最高曾经达到过85美元。更让人担忧的是，2008年我国光伏企业还不足100家，至今已膨胀至500余家，眼下国内的产能估计已经达到30GW~40GW，而2011年全球光伏装机量预计才达到21GW，也就是说，即使全球都用中国的光伏电池，中国还是有1/3~1/2的产能要放空，工厂要关门。产业技术看似升级了，日益膨胀的产能转瞬间就成为不良资产。诚如上海交通大学学者马德秀所言，现阶段一半以上的光伏企业处于停业状态，从一哄而上到一哄而散，制造出的是一场“虚热”。

光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战略性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要避免一时一地突击上马，而应着眼全局、立足实际谋篇布局，必须拒绝功利化倾向，必须摒弃浮躁与浮夸。尤其还应认识到，光伏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应该尽可能避免市场结构不合理和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给国内光伏产业带来的隐患。现在，中国光伏企业数百家，八九成都是靠国际市场销售，特别是欧洲市场。一些光伏企业一提起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政策补贴措施，就眼睛放光，十分兴奋，觉得“那里到处是金矿”。而对国内市场的开拓，他们习惯于把责任推给政府，“政策不给力，电网不完善，补贴不充分，市场自然难以打开”。这些年来，无论是行业龙头还是诸多中小企业，他们自己在深入研究太阳能产品在中国大城市以及农村地区如何大规模推广应用上都乏善可陈。哪怕是最熟知的光伏玻璃幕墙，谈了这么多年，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几乎没怎么运用到新建楼宇和楼宇改建中去。试想，大家一头热地梦想到欧美淘金，又丝毫不顾及国外市场的波动风险，不潜心开拓国内市场，“一条腿走路，总会跌个大跟头”，而遭遇美国“双反”申诉也就不可避免。

把坏事转化为好事

美国“双反”申诉，把视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翘楚的光伏产业，如今推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风口浪尖上，拖向了生死的边缘，表面上看是一件坏事。但实质上来看，又是一件好事，会让中国光伏企业在应诉美国“双反”申诉中重新思考中国光伏产业前行的道路与方向，反思只讲数量、速度，不讲质量、效益给光伏这个新兴产业带来的伤害和危机，只有不“高估”光伏产业的将来，也不“低估”光伏产业的现在，以科学发展的崭新理念与创新机制为引导和保障，确保中国光伏产业少走或者说不走弯路，在应对国际光伏产业风起云涌时才能变得从容不迫，从而稳操胜券。

焦点评论

打击内幕交易向“深水区”推进

蒋悦音

备受关注的保荐人内幕交易第一案“中信证券谢风华案”近日已在上海高院开庭审理，谢风华夫妇在庭上对ST兴业案的相关指控表示无异议，但否认在万好万家问题上存在内幕交易。同为投行高管、华泰证券投行高级副总裁的安雪梅（谢妻）被指利用同样由谢风华操刀的万好万家等股票重组事宜进行内幕交易非法获利数百万元，不过市场普遍推测其最终的实际获利或将远远大于这一数字。案发后谢风华夫妇双双逃往新西兰企图躲避刑罚，在国际刑警发出通缉令后不久，谢风华夫妇双双归案并被中国警方逮捕。

笔者以为，从近期中国打击内幕交易的动向明显可见，一批投行高管和公募基金业高管内幕交易案终于开始向前推进，预示着严打内幕交易向金融业“深水区”推进的大幕已经实质性开启，这将是继上一波“严打政府官员内幕交易”风暴之后的又一次证券市场风气澄清进程。

一直以来，内幕交易、老鼠仓和PE腐败三大问题，是金融证券业饱受市场质疑和斥责的“三大顽疾”，受制于各种原因，对其司法打击进程总是处于过于迟缓滞后状态。不过从中国证监会此前刚刚公布的一批“进一步加大稽查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大刑事追责力度”战果来看，将严打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向金融业“深水区”推进的决心显露无遗。以轰动一时的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原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李旭利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证券交易非法获利案为例，李旭利已被公安机关逮捕并将进入司法审判程序，这是继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原基金经理许春茂利用职务便利从事证券交易非法获利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之后的又一起基金高管证券违法案件，且其更具严惩的典型标杆案件条件。

从实际情况看，A股市场与美国、香港等国际发达资本市场金融业内幕交易案件的不同之处在于，目前A股市场面临的此类违法违规现象不仅仅是“信息防火墙”形同虚设、不防火问题，而是更直接的操作人和决策人等“一线人员”犯罪问题，这比一般的“二线人员”犯罪和“信息防火墙”失灵等性质更为严重。因为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反映出的是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文化中道德风险属于根深蒂固型缺失，这一方面说明了打击金融业证券犯罪的任务艰巨，另一方面更说明了这种严打方向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任何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成长的“蜕变期”，而一个个像墓碑一样的案件警示牌成为市场法治奠基石是一种必然现象，这种法治基础夯得越深越结实，只会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越有利，只会对投资者利益保护和市场可持续发展越有利。虽然孟德斯鸠认为“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但量变终会导致质变，这是良性资本市场文化不断沉淀、积累的一个必要前提。

李旭利老鼠仓案移交司法处理

重拳出击老鼠仓，岂容硕鼠太猖狂！
当年基金称雄客，如今司法立案郎。
资本增值靠诚信，股市淘金拒肮脏。
不义之财莫伸手，风云一枕是黄粱。

唐志顺/漫画
孙勇/诗

中国援欧：前提虚假逻辑混乱

让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低收入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向聚集了最多富裕人群的经典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经援，既不符合市场法则，也有悖于公认的道德评判。尽管欧元体系解体未必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拯救欧元区的钥匙依然握在欧陆核心大国手中。

章玉贵

当下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最大风险莫过于欧元区可能滑向解体的边缘。

日前，被广泛视为欧元体系最薄弱环节的“欧猪五国”尽管先后出现了政府更迭，但危机并未因此得以缓解。早先，欧洲和世界都以十分纠结的心态观察希腊政府应对危机的相关策略；而今，当造成欧元体系可能解体的风暴眼移至欧元区第三经济大国的意大利时，即便原本底气较足的德国也不敢大意了。因为意大利的经济规模与债务规模远远高于希腊。假如不能找到有效拯救方案，即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能向意大利提供金融支持以恢复市场对意大利偿债能力的认可，恐怕也是泥牛入海。

福利制度日渐异化的产物

自从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有关危机成因的讨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现在再来指责欧陆领袖们当初在推进货币一体化时忽视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法割裂，已经于事无补。不过，有关危机传播路径的判断是极为明确的，即：发端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通过传导机制在欧洲产生了“达尔文主义”式冲击，于是欧元链条中最薄弱环节的希腊作为德法烫手的山芋最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到来了。而希腊之所以沦为欧元区经济链条最薄弱环节，显性的原因在于欧洲为拯救受伤严重的金融业祭出扩张性财政政策落下的后遗症；进一步的原因是投机资本为博取海量收益而对欧元尤其是希腊金融业进行的空前狙击，以及标准普尔、穆迪等信贷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看起来比较稳健实则虚实倒挂的欧元区经济，为市场风险被人为放大提供了可能条件。

希腊只是欧元区危机较为严重国家的缩影。环视当今欧洲，除了德国和瑞典等少数国家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勤勉和创新精神之外，其他国家都有金融化享受的倾向。严重的失业不仅使得数以千万的失业者要求以被救济者身份分享社会劳动成果，而且造成不少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无法充分发挥创造财富的功能。其结果，不少国家每年产值的将近三分之一被社会福利和救济所吞噬，政府的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再加上工业发展相对停滞以及赢利创新能力的不断衰退，国民经济于是陷入恶性循环状态。

可见，欧债危机某种意义上说是欧洲经济福利制度日渐异化的产物。而在当今的欧洲政治生态下，拯救欧元问题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动员能力日渐衰弱的欧洲政治领袖更多时候会被早已习惯了“金融化生存”和“高福利享受”的选民情绪所绑架，不敢祭出有效但会触及民众既有福利水平的紧缩经济政策。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欧洲远未山穷水尽

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尽管欧洲生病，全世界跟着买单和吃药的逻辑的确有点霸道；尽管同在工业化国家阵营的个别主要大国确实怀着隔岸观火的心态在注视着欧元的下一步命运，使得老欧洲们有苦说不出，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欧元体系崩溃尽管有利于既有储备货币的进一步强大，却未必符合世界的整体利益。因此，尽管有关专家断定欧元解体是宿命，解决欧债危机的办法是欧元区解体，而非财政一体化，但站在欧元区的立场来看，毕竟欧元的建立承载着欧洲乃至人类的部分理想。以区内参差不齐的经济基本面来看，除了少数财力丰富的国家能够承受得起欧元体系的解体之外，大部分成员国可能面临灾难性冲击。

因此，拯救欧元体系尽管被部分专家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欧洲远未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谁都知道，欧洲的现状是国不穷民也富。欧洲尤其不缺富可敌国的超级企业。毕竟全球企业500强中欧洲所占的份额大约还有三分之一。假如欧元区国家能够建立一个合理机制，整合有关市场主体的拯救能力，并让享受福利资本主义好多年的各国百姓适时做好勒紧裤带的准备，则欧元体系不大可能迅速崩溃。

欧洲并不缺少拯救欧元的选项。老辣的欧洲国家可能是想通过释放欧元可能解体的信号，借助中国等外部援助杠杆，以最小代价完成挽救欧元体系的任务。

不可能有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在信息日渐对称的世界里，让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低收入人口破亿的发展中国家向聚集了最多富裕人群的经典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经援，既不符合市场法则，也有悖于公认的道德评判。

众所周知，所谓中国援欧的缘由，既有国际责任论，也有对中国高达3.2万亿美元外储的眼红。其实，从所承担的国际责任来看，最应该援欧的国家应当是美国。60年前，是美国掏钱挽救了欧洲资本主义，但欧洲付出的中长期代价其实一点也不低。美国不仅在政治和安全上控制了欧洲，更在经济上全面压制了德法意等经典资本主义强国。如今，中国根本没有当年美国那样的全球野心。况且与美国等储备货币国家仰赖金融霸权或者霸权红利低成本获得对外金融资产不同，中国如今握有的这些外储，其真正有意义的那部分乃是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辛苦劳作换来的“血汗钱”，笔者估计不会超过6000亿美元。考虑到外汇使用额度的需要，中国一次性最多能够拿出1000亿美元。而这笔钱即便全部投放到欧元区，恐怕也是杯水车薪。

事实上，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从来不吝啬。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已向亚非拉和南太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受援国建成了2000多个项目。已有近10万名官员及管理和技术人才来华参加了培训和研修。2000年以来，中国多次宣布对外免债。而为了帮助非洲经济发展，中国还设立了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等等。所有这些，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大国承担的力所能及国际义务。

另一方面，假如中国最终向欧洲伸出援手，则欧洲会否拿出相应的回报清单完全是未知数。例如，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否主动提高中国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份额等这些极为敏感的战略性问题，这些年来欧洲作为筹码一直紧握在手。

不过，时间似乎并不站在欧洲这边。中国可以等。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中国研发投资排名跃升的启示

郝晓彤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1月14日在日内瓦首次就全球知识产权状况发表了题为《变化中的创新》的报告。据该报告披露，近年来中国在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R&D）方面进展较快，截至2009年，中国的研发总体投入资金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一跃成为排名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投资国。笔者以为，这一信息中传递和包含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彰显了我国科技兴国战略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受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历经起伏波动，政策层面的方针措施也是更迭不断，但“科技兴国”、“科教兴国”的战略却坚持未变，并且始终得到了较为坚定彻底的贯彻落实，从而为中国R&D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制度基础，推动其不断前进。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R&D更是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0年由国家统计局、发改委等6部委联合进行的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资源清查活动报告显示，从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我国R&D总经费保持了年平均23.0%的增长速度，在2009年达到5802.1亿元，是2000年的6.5倍，R&D经费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70%，比2000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进步不可谓不明显。

第二，体现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改革的成效。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改变粗放型发展模式，淘汰落后生产方式，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优化资源在第一、二、三产业间的配置，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上述目标的实现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和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充分发挥。而R&D正是促进科技进步的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动力源，因此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目标的关键要素。R&D投入力度的加大，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进程中科技生产力的作用在增强，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朝着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先进方向上发生着可喜的变化。

第三，反映了全球研发格局的未来发展趋势。本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还显示，全球研发方面的投资从1993年到2009年增加了约两倍，其中70%的投资来自于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其比例在缩小，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发投资同期增长了13%，这其中由中国贡献的份额已经上升到10%。近些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导致其出现了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而相比之下，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表现在R&D方面，就是投入资金量的不断加大和全球占比的持续提高。按照目前的情况推演，我们有理由相信，除非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严重的麻烦，中国在引领全球R&D发展趋势的角逐中将会有更抢眼的表现。

成绩固然是令人振奋的，但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投入规模上去了，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量变，在衡量R&D实力最为关键的专利数量、研究人员密度等核心指标方面，我国与美欧发达国家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还需不断努力追赶。在未来岁月中，要想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R&D大国，实现我国R&D事业由量变到质变的根本转化，笔者认为除了要继续贯彻实施科教优先发展的战略，不断加大相应的资金投入外，还应当秉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到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这三大社会研发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方面，推动产学研立体化、协同化、市场化运作模式，实现投入资金规模的有序扩充，以及R&D资金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作者系上海证券研究所总经理助理）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